

北海文史

第六辑

不懈的奋斗、无私的奉献

——何醒予同志传略

钱海建

醒予是一位沉着、勇敢、坚定的新女性，青年时代毅然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在1938年抗日战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海“妇女抗敌同志会”会长、合浦公馆区交通站长、合浦上廉党支部书记、合东南工委组织委员等职。在长期残酷的斗争岁月里，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眼疾和身体衰弱带来的困难，出生入死，忘我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她虽无子女后代，但她的好思想、好作风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逝世后，人们深切地怀念她。

冲破束缚 追求真理

醒予于一九一〇年出生于北海一个破落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其父亲是开明人士，十分宠爱作为长女的醒予，不主张给她订婚，要她将来做个自由女。从小受其父影响，喜爱读书，对新鲜事物尤感兴趣。七岁时，父亲病逝，由母亲领她进就近的私塾读书，不料这老师是十足的封建学究，向学童们灌输忠、孝、悌、义的封建毒素，醒予十分讨厌，不愿再上学，她转到中山东路钟兰舫私塾就读，接触了先生的儿子钟辉廉（大革命时期总工会负责人），钟借给她反对封建礼教，要求人权独立的进步书籍，还给她讲革命道理，醒予模糊地认识到只有反对封建压迫，才是妇女的出路。

但是，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犹如洪水猛兽，吞噬着每个中国女子的命运，醒予自然避免不了厄运。按照母亲的愿望，要培养醒予为闺秀。十六岁那年，母亲为她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对象，要她停学结婚，她不从，继续在升中班补习，准备报考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母亲为此大发雷霆，不再提供学费，无奈，她被迫结婚。受新潮流影响的醒予，不能循规蹈矩地过封建家庭生活，加上丈夫是个浪荡分子，终日无所事事，学抽大烟度日，稍不如意，就对她拳脚相加。

婆婆是典型的封建式家长，不但不制止儿子虐待妻子的行为，反而常常无端责骂她，醒予十分痛恨这个家。不久丈夫病逝，这时期，她的女友陈锡贞不断介绍了玲、茅盾、冰心等人的小说给她看，增添了她的斗争勇气，她跑回娘家吃住，向母亲诉说夫家的可恶，得到母亲的同情和亲友的支持，夫家派人来逼她回家，她连面也不露，坚持了三年，终于离开这烦闷的家庭。以后她不再结婚，把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

三三年，醒予考上了合浦一中。后因母亲付不起学费而辍学，她立志自食其力，随女友陈锡贞到广州报考半工读学校，碰巧那里不招生，只得返乡，帮母亲料理家务以待时机。三五年二度到广州，也是四处碰壁。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一个没有势力后台的女子要谋职立业，谈何容易。幸而，由陈锡贞的推荐认识了中大学生黄道悟(党的培养对象)，懂得不少革命道理，送些进步书籍给她，向她讲述中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抗战遭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悲壮事件，告诉她只有参加党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才是中国青年的唯一出路。醒予受到启发，决心返家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自三四年始，北部湾畔的抗日烽火愈烧愈烈。“一二·九”运动在北海引起极大的反响，广大学生、青年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军队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抵制和查辑日货，并陆续建立各种进步读书会。醒予看到家乡的革命形势发展得这样快，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振奋。此时，她弟弟何国达与合浦一中进步学生庞自、吴世光、陈广材、卢传义等人在她家里组织“静励斋”读书会。这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把解救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危机视为奋斗目标，他们经常会聚一起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出版进步刊物。“静励斋”的活动给醒予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境地，她常常参加会员们思路开阔的讨论，从中得到很大的启迪。

三七年底，在广州入党的赵世尧返家乡准备重建党组织，到“静励斋”指导他们的学习，教育青年学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广大青年应该紧跟党，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使醒予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她感到当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和崇高，入党的愿望强烈，迫切要找到党，她不知道北海党组织已秘密地重建起来，更不知道与她们朝夕相处的赵世尧同志是共产党员，她想到

革命圣地延安去，接受革命的熏陶。后因武汉失陷没有去成。

投身革命 女中英杰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更加疯狂地大肆侵犯我国领土，耳闻目睹了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醒予心中的愤恨。为了千千万万人不做亡国奴，她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三八年四月，在北海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推动下，成立了“北海妇女抗敌后援会”等三个群众组织，后援会负责人赵世尧有意识安排一批党员、进步青年任负责人，醒予被任为“妇抗会”会长，她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与“妇抗会”另几位骨干卢冠群、蔡秀英、邓筱筠等深入街道、工厂做动员工作。发动家庭妇女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挨家逐户鼓励她们冲破家庭束缚，走向社会，争取妇女的解放。经过努力，全市有二百多妇女报名参加了“妇抗会”。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她根据妇女的特点，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如组织晨呼队，沿街边跑边高呼口号，唱抗战歌曲。办夜校，组织失学的妇女读书，她自编课本，亲自上课，在教文化的同时编排抗日救亡话剧，到街头闹市演出，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

三八年九月，涠洲岛沦陷，日舰经常拓北海、合浦海面一带骚扰，驻军常备中队常年戍守在高沙垌、白虎头一带。醒予组织会员到街上募捐款与物资，慰劳爱国将士。青年时代的醒予性格内向，平时不苟言谈，但演说起来颇有特色，使在场的官兵深受感动。

醒予身体力行，严求于己，火般热情，时时处处为同志们的表率。三八年期间，北海时有日机来轰炸，“妇抗会”组织了一个救护队，她兼任队长。与队员们到壁笆楼(今一幼)永年医院(今市府二宿舍内)带头学包扎技术，如有战事，即奔赴战地。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妇抗会”成立女壮丁队，以随时迎击来犯之敌，党组织集中她们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政治课由中共党员李梓明上，军事课一时找不到教官，她便多次去镇公所交涉，要求派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军官作教官，使女壮丁队的军事训练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一九三八年九月，醒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思想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在向入党介绍人卢传义同志汇报思想情况时说：“人活着，要活得有价值，死要死得有意义，我一生的意义在于改造社会。”这个崇高的信念支撑着

她，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多么危险的情况下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醒予还起了个名字叫“何畏”，表达了对旧势力无所畏惧的决心。

克尽职守 矢志不渝

三九年二月，醒予到浦北福旺一带，开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工作，组织、教育贫苦群众，积极培养进步青年入党，团结、争取社会上层，壮大党的抗日力量。遵照组织的指示，她和同濂的女青年卢冠群利用谢王岗同志的社会关系，到福旺坡村开明地主李德三家当家庭教师为掩护，进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她们办妇女识字班，自编课本，教妇女识字，号召她们参加抗日斗争，争取自身和全民族的解放。在穷乡僻壤里办识字班，是件新鲜事，起初，妇女们兴趣很高，有的甚至背着小孩来参加，但时过不久，人渐渐少了，醒予了解到缺课的是因家务较忙，便把学习安排在午间、晚上，争取了更多的妇女参加学习，并发动她们到邻村去宣传抗战政策和时事等。使当地的抗日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

醒予不但依靠发动劳苦妇女，也团结教育、引导、有钱人家的妇女走革命道路。李德三的媳妇宋传克年轻守寡，深受封建家庭“三从四德”的压迫，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囚笼式生活，象女佣般侍候公婆，还常受虐待。醒予、冠群很同情她，想接近她，但这逆来顺受的妇女怕公婆反感，不敢接触，有意避开。只得设法找机会与她一起做鞋缝衣。宋传克见她们大姐姐似的和蔼可亲，渐渐地谈心里话，醒予鼓励她做一个新女性。宋传克在她们的支持下，说服公婆，参加了识字班，学习和懂得了不少文化与革命道理，对醒予的工作给予很大的帮助，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合浦乐民中心学校教书时，得到教务主任的支持，所教的内容由醒予选择，她将语文课变成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的课堂。很受学生的爱戴，一有机会就往老师住处跑，听讲革命故事。有些家长胆小怕事，不让子女来上学，她就登门告诉家长，我们正处于“国难当头”的境地，每个中国人都要以挽救国家危难为己任。家长们深受教育，陆续送子女返学。醒予播下的抗日火种在这个地区越烧越旺。

在福旺教师期间，曾因掩护三个游击队员身份暴露，转移后党组织暂时中

断联系。这期间，她仍坚持用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培养入党对象，宋传克、宋德韶、周雪峰、谢善高等就是醒予当时培养的。宋琪英、谢善璋因起义与党组织失掉联系，虽与他们无组织关系，但也团结一起，互相勉励，增强信心，边积极向群众宣传，边积极寻找党组织。

四三年八月，组织上决定调她到福旺中心小学教书，这学校政治环境差，校长是退伍的伪连长，思想反动，经常偷听老师上课，发现有宣传抗日者，唯其是问。而且封建意识极浓厚，男女界限壁垒森严，醒予接触进步男老师遭其责难。醒予曾组织老师与其斗争，但此人在地方势力大，无人可撼，工作开展不起，心里焦急。组织上看到她的难处，予四四年春调她到灵山平山凌家小学与岑家毅、蔡维中一起以教书作掩护。醒予换上了工作环境，又以全部的热情投入了工作。自四七年始，醒予任党内的领导工作，更加克己奉公，忘我工作，作风严谨，处事果断，在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同志们中赢得崇高的威信。四七年十月，她调到公馆浪坡村加强党支部工作，不久，游击队攻打附近的荔枝村，缴获了伪保安团的一大批物资，准备支援大部队。驻扎在附近的国民党县大队长，扬言要“接收”这批物资，党支部获悉后，商量转移，但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将物资分给各家各户埋藏，有的主张统一转移，醒予考虑情况紧迫，凭着平时的威信，当机立断，决定统一转移，使扫荡的敌人一无所获。

一四八年，醒予任合浦公馆区交通站长，总站下辖浪坡、由樟、白沙、南康、石湖等交通站。她对各交通站的工作严加督促，不辞劳苦地往返于各站之间。从公馆到南康等地的陆路有国民党匪兵，为保安大队驻防，行动不便，她与几位男同志就从海上走，为了不麻烦群众，自己找来竹筏，任风浪送他们到目的地，虽随时有落水的危险，但毫不惧怕。退潮时，一片泥泞的滩涂，竹筏用不上。就行走在粘脚的烂泥中，醒予的脚不时被牡蛎划破，刺心的疼痛，她咬咬牙，坚持走完这段艰难的路程。

公而忘私 舍己救人

在醒予的心目中，党的事业，同志们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她公而忘私，舍生忘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品质。

在北海，高德一带秘密张贴毛泽东同志签发的关于反逆流的电文的传单，

为营救被捕的同志四处奔波，出谋献策。还动员从小江迂回北海开办永桢祥药行的妹妹何娥英就此建立地下党交通站，帮助党组织筹集资金。

北海党组织的英勇顽强的斗争触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廉北区委获悉后秘密通知北海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同志撤退，醒予也在此列。她不顾个人的安危，凭借她家在当地的名望，掩护了几位同志先撤离，她最后一个离开北海，到小江进行隐蔽的地下工作。

四五年五月浦北小江游击队队长练炳强三人，到福旺坡村找醒予，了解敌特布防，准备攻打小江墟。此时的敌人已是风声鹤唳，戒备森严。在村口查岗的一伪兵听出练的口音非本地人，暗中盯梢至醒予住处。掌灯时分，地主家已重锁大门，醒予与练三人正在分析敌情，三、四个伪兵前来击门，气势汹汹要检查。练三人用枪逼住李德三，不准他开门。李很害怕，见练三人来头不小，且带着枪，此非等闲之辈，不敢声张，只好按醒予的意思在里屋回答伪兵：三人是何老师的朋友，从北海来探她的。伪兵在外磨了一阵，无可奈何，悻悻离去，临走时，要地主担保三人，明早到乡公所查身份。

这时，情况十分危急，醒予明白三位游击队员不能在此久留。待伪兵离去，径直到李德三的卧室，要他放走练队长三人，李惊恐万分，怕乡公所明天要不到人，难保身家性命。醒予晓以大义，向李宣传党的政策，用开明地主援救革命同志的真实事例教育他，劝他不要放弃营救的机会，他虽点头称是，但仍不肯放人。醒予见软的不行，急中生智，坐近李的床头，抽出枕头底的一支左轮，义正词严地说：“你不放他们，我就打死你，然后我自杀。”胆小如鼠的地主被吓得手颤脚震，答应放人。此时，醒予的身份已暴露，练队长叫她一同撤离，她考虑自己有眼疾，怕拖累大家，留了下来。第二天，在宋传克的帮助下，转移到福旺山鸡曲村，继续坚持隐蔽的地下工作。组织群众，联系党员，宣传抗日政策。

唇齿相依 深情厚意

在革命斗争中，醒予紧紧地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她作风朴素，平易近人，生活从不特殊化。她每到一个地方，就走东家、串西家，熟悉每户群众，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掌握开展工作的方法。农忙时，她活跃

在田间，农闲时，她帮住户烧饭、带孩子、教儿童学文化等，深受群众的欢迎。因她排行第二，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何二姐”。

醒予很关心群众的疾苦。当时，公馆一带常有疟疾发生。在北海开药行的妹妹从北海捎来药品给她备用，但她看到当地的患病群众缺医少药，立即把药送给了他们。经常对乡村姐妹嘘寒问暖。醒予日夜奔波，虚弱的身体每况愈下，她自己顾不上调养，群众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常常想法找些食品给她补养身体。一次，群众好不容易弄来几两猪肉，她虽婉言谢绝，但群众坚持要留下，群众一离开，她马上送给了正在养病的同志。四六、四七年间，国民党对山区进行大扫荡，醒予所在区交通站经常遭敌人的袭击。遇到敌情，群众就赶快替她梳髻换衫，扮成老太婆，给她一担箩箕，混杂在田间劳动的妇女中，或转移到村外。虽然危急情况经常发生，但醒予都在群众的帮助下，化险为夷。

在革命队伍中，醒予是大伙的贴心人，凡是接触过她的人，都说她象寒冬里的一把火，能温暖别人的心。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诚心诚意对待同志。三五年，“静励斋”读书会的成员大多在她家吃住，醒予和母亲热情招待这群热烈追求进步的小青年。后来她家被辟为党的地下联络站时，她对熟悉或陌生的同志，一律以礼相待。

她先后负责的香山、浪坡交通站，人员来往频繁，在物质相当匮乏的条件下，想尽办法找食物给同志们充饥，使大家感到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四八年某月，公馆区武工队的廖世津带两人执行任务时，在香草江附近遭敌人伏击，两个队员逃出后回到醒予所在浪坡交通站，不知廖的下落，她即派人四处寻找，当廖辗转回到交通站已是深夜，他们一天一夜粒米未沾，醒予赶快请住户煮饭弄菜，三人吃着热乎乎的饭菜，内心感激“二姐”的关怀。

醒予对患病负伤的同志，更是倾注深厚的感情。四〇年，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同志患重病在小江医治，组织上要醒予负责照料，她二话不说，收拾行装从寨圩赶到小江潘屋交通联络站，侍奉汤药，煮饭洗衣，尽职尽责。当时蔡维中、何国达等同志也在一起照料。四七、四八年粤桂边区部队、游击队的伤员大多撤到香山、浪坡等交通站治疗，醒予身为站长。组织力量照料伤员，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每批归队的同志，都有一种依依惜别的深情。

解放后，醒予历任合浦县委组织部干事，钦州专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劳动科副科长，自治区劳动局救济科长，办公室主任等职。她虽然地位变了，但献身革命的初衷不改，一直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以致积劳成疾，视力急剧衰退。在“文革”期间，她受到“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精神上、肉体上遭受打击、摧残，以致不能正常工作。她服从组织安排于七二年离职休养。离休后，她人闲心不闲，人老志尔坚，她时刻想着党的事业，牵挂着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为他们恢复名誉、平反安置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她小小寓所里，经常挤满来看望她们人，她双目已失明，只能凭声音辩人，但她仍充满乐观精神，拉着别人的手问长问短，忧别人之所忧，乐别人之所乐，鼓励大家增强革命信念，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有外地的同志，她热情留客，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海味，摸索着为客人炒菜，同志们都说：“二姐把心都掏出来了。”

七八年，醒予因重病住院，革命老区的乡亲们闻讯后，非常悲痛，香山一位老交通员受乡亲们的嘱托，捎了十多斤荔枝来探望她，她虽已重病缠身，仍然想到别人，她托人将荔枝送给住院的老同志。一位长期卧病榻的老同志，捧着几颗荔枝，老泪纵横，轻轻呼唤着“二姐”的名字。

醒予同志的一生，是追求革命、不懈战斗的一生，她在对革命的无私奉献和对同志的备至关怀中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她的战友伍朝汉等同志在挽联中写道：《无私无畏献丹心》、《磊落长如松柏翠》一忠贞共与日同辉》、《满腔热血为民洒》、《一身洁白玉无暇》、《志坚行高肝胆忠》、《功赫美德献中华》。这是醒予同志伟大人格的写照，她虽然已离开她热爱的事业，但她的艰苦奋斗，献身革命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